

# 从《驯悍记》看莎士比亚的男权思想

杨晓莲<sup>1</sup>,张丽霞<sup>2</sup>

(1.四川外语学院中文系,重庆 400031,2.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重庆 400031)

**【摘要】**在《驯悍记》中,莎士比亚以男权视角塑造了凯瑟丽娜这一“悍妇”形象,并让“悍妇”被其丈夫驯服,最终成为失去自我的“贤妻”,这一模式流露出作家的男权思想。文章通过形象塑造、情节发展、人物语言来解读《驯悍记》所表现的男权思想,进一步分析了男权思想在莎士比亚其他作品中的体现,同时指出:莎士比亚的男权思想是与时代、性别的局限和个人经历分不开的。

**【关键词】**莎士比亚;《驯悍记》;男权思想;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004(2010)02-0060-06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作家,虽然在他的笔下表现了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但是由于所处时代、个人经历以及作家本人的男性身份使他不可避免地误解和歪曲女性人物,与当时男权社会对妇女的态度相一致,展示的依然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而其喜剧《驯悍记》则最鲜明地表现了他的男权思想。

## 一、《驯悍记》的男权思想

从男性视角来看,《驯悍记》是一出喜剧,但是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则是一出表现女性主体性丧失的悲剧。在《驯悍记》中,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发展,还是人物的语言等方面都表现出莎士比亚的男权思想。

### (一)人物形象塑造蕴含着男权思想

苏珊·帕曼·科尼伦在其《小说中的妇女形象》一书中,把西方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为“天使型”和“恶魔型”(妖妇型)两种类型。国内学者一般把西方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以美貌、忠贞、温顺、富于献身精神等为特征的“家庭天使”型;一类是以美色加淫荡为主导特性,以至“倾国”、“倾城”的“红颜祸水”型;第三类是以凶悍、泼辣、狂暴与工于心计等为特

收稿日期:2009-07-19

作者简介:杨晓莲(1964-),女,四川岳池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张丽霞(1981-),女,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生。

征,对现存秩序具有最大破坏力的悍妇恶女型。<sup>[1]</sup>西方男权文学中的众多“天使”实质上只是男性审美理想的体现,而“悍妇”则不过是男权文化的叛逆者,应该说,“悍妇”形象,是男权文化思维一手捏造出来的。

在《驯悍记》中,莎士比亚就把凯瑟丽娜塑造成一个“悍名四播”的女人,她“脾气非常之坏,撒起泼来,谁也吃她不消”。<sup>[2]226</sup>人们认为她是“灾难”,是“疯子”、是“活阎王”、是“野猫”,应该找个“魔鬼”给她。以至于男人们都把凯瑟丽娜当作凶悍泼辣的女人而躲避,葛莱米奥老爹说:“宁愿每天给人绑在柱子上抽一顿鞭子,作为娶她回去的交换条件。”<sup>[2]219</sup>霍坦西奥说:“即使我是个身无立锥之地的穷光蛋,她愿意倒贴一座金矿给我,我也要敬谢不敏的。”<sup>[2]226</sup>由此可以看出,莎士比亚从男性单一的性别歧视出发,对女性形象进行了丑化和贬低。作者极力渲染凯瑟丽娜的“悍”,用张扬的笔触描写凯瑟丽娜的“悍”,表达了对凯瑟丽娜“悍”的厌恶,从而才要“驯悍”。

如果站在客观立场来看待凯瑟丽娜,应该说她只是没有完全服从当时社会对女性做出的种种规定而已,或者说,她的主体意识强烈,以至于不符合以男性意识为中心的传统对女性价值的评判。因为,悍妇之所以“悍”,在很大程度上是父权思想压迫下的发泄。在剧中,凯瑟丽娜的父亲不仅不爱她,反而把她当作急于出手的货物。所以,凯瑟丽娜发泄了对父亲的不满,也抨击了对她出言不逊的男人,她还讨厌妹妹装作乖巧的模样去讨别人欢心。她反叛地说:“我相信我也有说话的权利”,<sup>[2]276</sup>“难道我就得听人家安排时间,仿佛自己连要什么不要什么都不知道吗?”<sup>[2]218</sup>可见,凯瑟丽娜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命运做斗争,她是独立、有思想、勇敢而真实的个体。然而,在凯瑟丽娜生活的时代,一切具有叛逆性格和个体冲动的言行都成为禁忌,惟命是从、柔弱顺从成为普遍流行的范式。于是,人们把具有叛逆精神的凯瑟丽娜当作一个悍妇形象而加以防范。

在戏剧的结尾,凯瑟丽娜被丈夫彼特鲁乔驯服了,她一改“悍妇”形象而成了一个顺从和本分的“贤妻”形象。这个量身打造的形象完全符合了男性心中的“天使”。将贤妻作为女性的楷模和学

习的典范,是男性权威文化的表现,而驯服凯瑟丽娜对彼特鲁乔而言,“预兆着和睦、亲爱和恬静的生活,尊严的统治和合法的主权”。<sup>[2]297</sup>

从剧中人物形象选择上看,母亲形象的缺场也显示出作者潜意识的男权思想。剧本中没有出现凯瑟丽娜的母亲,从女儿一落地,父亲巴普提斯塔就带着“男尊女卑”的有色目光看她,把她视为私有财产,剥夺她的人身自由,并且绝对掌握女儿的命运。当彼特鲁乔来求婚时,巴普提斯塔未经女儿同意,就决定了女儿的婚事,而凯瑟丽娜的反抗和叫嚷全无用处。这是对父权地位的认同,也是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压制。父权制通过父亲在家庭中行使着将女性物化、客体化的权力,使女性从出生起就处于社会和家庭的边缘。<sup>[3]</sup>

## (二)情节的发展体现了男权思想

从情节发展来看,彼特鲁乔的求婚、结婚、驯服等过程都体现了男权思想。彼特鲁乔是个追求实利的人,他向凯瑟丽娜求婚并非出于爱,而主要是为了钱。“我的求婚主要是为了钱,无论她怎样淫贱老丑,凶悍泼辣,我都一样欢迎,只要她的嫁妆丰盛,我就心满意足了。”<sup>[2]225</sup>他来到巴普提斯塔家中还没见过凯瑟丽娜,就先问嫁妆,听到巴普提斯塔给出的条件优厚,便立马要求先定好契约。可见,对于彼特鲁乔来说,只要“嫁妆丰盛”,任何一个女人他都可以娶。可见,他对婚姻的态度是建立在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上的,所以他说:“霍顿西奥,你可不知道金钱的好处哩!尽管她骂起人来像秋天的雷鸣一样震耳欲聋,我也要把她娶回家来。”(第一幕第二场)<sup>[2]226</sup>在这里,彼特鲁乔并没有把凯瑟丽娜当作一个人去看待,而是一笔钱,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器皿,一个被征服者,一个猎物,一个客体。

而“驯妻”本身的动机就包含了对女性的驾驭,包含了男性从自我性别出发,去打造女性的愿望。《驯悍记》的题目,The Tame of the shrew,在朗文高阶英语字典中,对tame的解释是这样的:to train a wild animal to obey you and not to attack people。<sup>[4]</sup>莎翁欲借男主人公之手,将他们认为如同动物般的悍妇凯瑟丽娜驯服。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彼特鲁乔就没有把凯瑟丽娜视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自主意识的“人”,所以他才要用驯服动物

的方法去对付凯瑟丽娜，让她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折磨。

对于男性来说，凯瑟丽娜是“活阎罗”，而把她驯服成一个“羔羊”、“鸽子”，可谓皆大欢喜。于是作者用“喜剧”的形式演绎了这出“驯悍记”，让观众看到凯瑟丽娜的遭遇而感到好笑。同时戏中戏的结构也使凯瑟丽娜的遭遇处于被看的位置。在舞台上，她处于被驯服被侮辱的地位，在舞台下，人们都在欣赏她的遭遇。从女性视阈来看，凯瑟丽娜由“悍妇”变成“最听话的”妻子，是女性丧失主体性，成为臣服于男权的女奴的悲剧，即按男性从过分膨胀的自我性别立场出发而衍生的女性“镜像”重新塑造自己，是“女性在文化上被监禁与空间上受限制的生存状态，往往象征着女性真实自我、主体人格的分裂，呈现为一种虚幻的、被扭曲的、变形的形象”<sup>[5]</sup>

“驯悍”过程其实是男权制社会对女性压迫的表现。在驯妻的过程中表现出对女性的恶意嘲讽和践踏，作者借彼特鲁乔对“悍妇”施行了惩治和改造的政策。随着彼特鲁乔驯妻行动的推进，更进一步地加深了凯瑟丽娜命运的悲剧性。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夫妻关系。彼特鲁乔结婚时迟迟不来，来了之后又打扮得很奇怪，婚礼对一个女人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彼特鲁乔却故意出尽洋相，以摧残凯瑟丽娜骄傲的尊严，在众人面前使她难堪。新婚后，他“以体贴为名惩治妻子”，故意让她挨饿，不让她休息，不让她穿新衣回家等等。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凯瑟丽娜只身一人，势单力薄，连仆人们都听从彼特鲁乔的指挥，联合起来对付她，因此她只有无奈，只有忍耐。在两人回家的路上，彼特鲁乔指鹿为马，把太阳说成月亮，把老头说成姑娘，当凯瑟丽娜试图纠正他时，他便要挟她“我说他是什么就是什么，你要是说我错了，我就不到你父亲家里去”。<sup>[2]284</sup>最后，凯瑟丽娜屈服了，凯瑟丽娜收敛起她的锐气和傲气，归入到了低眉顺眼的“贤妻”行列之中。不仅如此，“归队”了的她还向其他女人现身说法：“一个女人对待她的丈夫，应当像臣子对待君王一样忠心恭顺；倘使她倔强使性，乖张暴戾，不服从他正当的愿望，那么她岂不是一个大逆不道、忘恩负义的叛徒？”<sup>[2]299</sup>

可以看出，一位有棱角有锋芒的女性在挥舞

的大棒下沉默了。这是因为她别无选择，她不可能做出走的娜拉。即使是19世纪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在社会尚未为妇女的真正解放提供条件的前提下，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向“傀儡之家”妥协。凯瑟丽娜的被驯服，体现了一个想反抗的女人被强行纳入男权轨道的心路历程。<sup>[6]</sup>

这就是男权话语下女性的命运，是男人对女人的理想化安排，她无力也无权抗拒。

### （三）剧中人物语言流露出了男权思想

首先，从剧中男性对女性的言辞上来看。巴普提斯塔坦说自己的大女儿是“滞手货”，“我现在就像是一个商人，因为货物急于出手，这注买卖究竟做得做不得，也在所不顾了”。<sup>[2]245</sup>彼特鲁乔是剧中夫权的代表人物，是个有着强烈争夺欲望、占有欲望和统治欲望的人。他始终奉行中世纪的传统观念，把妻子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彼特鲁乔说：她是我的家私，我的财产；她是我的房屋，我的田地，我的谷仓，我的马，我的牛，我的驴子，我的一切”；<sup>[2]260</sup>他认为丈夫有权像处理自己的家私一样处理自己的妻子。可见，无论父亲还是丈夫，都把凯瑟丽娜当作一个“物”，可以任意支配和处置。

其次，凯瑟丽娜的“妇道宣言”直接成了男权思想的传声筒。她不仅自己变成了奴隶，还充当了帮男人驯化其他女性的工具，向其他女人大谈妻子应当对丈夫忠心顺服的道理：“你的丈夫就是你的主人、你的生命、你的所有者、你的头脑、你的君王，一个女人对待她的丈夫，应当像臣子对待君王一样衷心恭顺。”<sup>[2]299</sup>这番话表露了赤裸裸的夫权思想，就连萧伯纳等男性读者也深表不满。凯瑟丽娜曾经那可以使男性霸权话语焦虑和恐惧的声音，一个站在主体位置上敢于与男性话语一比高低的声，最后被男性霸权话语“阉割”了。凯瑟丽娜不得不屈服于男性霸权的威力，又一次退回到客体的位置上，彻底丧失了自己女性主体意识的地位。女性话语权的被阉割，意味着男性霸权话语的胜利。从另一个侧面来讲，凯瑟丽娜话语权的被“阉割”，恰巧证明了男性对女性话语权的恐惧与焦虑。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女性建立自己话语权的重要性和持久性。否则，性别差异的砝码会永远偏向男性。<sup>[7]</sup>

凯瑟丽娜由被父权控制过渡到被夫权控制

了。在这里,作为被驯服的凯瑟丽娜诞生了,作为具有自主意识的凯瑟丽娜消失了。凯瑟丽娜起初的骄傲被“驯得”粉碎,她好像一只温顺的绵羊一样,放弃自我来获得男权社会的认同,为自己谋得一席生存之地。莎士比亚创造出“悍妇”并将其驯服,这一做法毫无疑问地体现出他的男权思想。

## 二、莎士比亚其他戏剧中的男权思想

除了《驯悍记》莎士比亚在其他作品中也表现出了男权思想。

首先,莎士比亚在剧作中表现出了对既定秩序和法则的维护与肯定。如合法的王位继承、威严的父亲权威、以及人伦孝悌、手足亲情、夫妻关系等等。在他看来,“诸天的星辰,在运行的时候,谁都恪守着自身的等级和地位,遵循着各自的不变的轨道,依照着一定的范围、季候和方式,履行它们经常的职责;……纪律是达到一切雄图的阶梯。”<sup>[8]138-139</sup>要是没有了纪律和秩序,没有“与生俱来的特权、尊长、君王、统治者、胜利者享有的特殊权利”,<sup>[8]139</sup>便会没有公理、没有是非和正义。

其次,莎士比亚认为女性的超越规范是造成悲剧与不和谐的原因。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者玛丽琳·弗兰克认为:“莎士比亚根据性别文化观,把两性本质两极化。男性的,即有序的,即流动的、游移的、无形的,因而是不完美的。”女性“以其善变的心态,教男性感到不安,无所适从”,“一再变化,令人无法捉摸”<sup>[9]</sup>。这就是说,世界的安全感和秩序感与妇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美丽却不道德的、应予以防范而又使人无法离弃的女人往往是“杀人的祸根、一切灾难的主因”。比如,《哈姆雷特》、《麦克白》、《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等剧,都表现了女人的性与爱之可怕的和致命的威胁性。<sup>[10]</sup>

在《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把母亲看作是失贞、淫荡、背信弃义的女人。正由于此,丹麦的大地为之震怒了,丹麦的秩序被打破,陷入了混乱、病态和灾难之中。“如果妇女——作为最值得信赖的母亲都不再令人相信,那么世界也就失去了意义。”<sup>[11]</sup>可见,王子的厌世和忧郁都是由于母亲的失贞。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莎士比亚把克莉奥佩特拉写得神秘多变、无法抵御、具有极大

的毁灭性:“岁月不能使她衰老……别的女人教她们所满足的人感到厌倦,可是她却使那些饱餐的人们益增饥渴;因为最可恨的事在她的身上都感到极为妥帖;圣洁的高僧甚至在她卖弄风骚的时候都会为她祝福。”<sup>[12]</sup>在她的诱惑下,那“扫遍过征战的大队与雄师”的英雄变成了“娼妇的弄臣”,把国家的重任掷在欢宴里,用荒淫的生活消磨他无可派遣的时间,战鼓不能唤起他的理智,国土“断送在轻轻的一吻里”、“除了死别无生路”。莎士比亚将尼罗河洪水泛滥般的灾难和毁灭力赋予了克莉奥佩特拉,正表现出他深刻的焦虑——“女性作为人类的创造者、意义的源泉,正是普遍的幻灭和最深刻、最具毁灭性的背叛的根源。”<sup>[13]</sup>

再次,对女性轻蔑的评论在莎剧中随处可见。如:在《第十二夜》里,奥西诺公爵正在热烈地追求奥丽维娅,但是在谈到女人时,他却不假思索地说:“女人的小小的身体一定受不住像爱情强加于我心中的那种激烈的搏跳;女人的心没有这样广大,可以藏得下这许多,她们缺少含忍的能力。唉,她们的爱就像一个人的口味一样,不是从肺腑里,而是从舌尖上感觉到的……”<sup>[14]</sup>在《奥瑟罗》中,奥瑟罗说:“我们可以在名义上把这些可爱的人儿称为我们所有,却不能支配她们的爱憎喜恶!我宁愿做一只蛤蟆,呼吸牢室中的浊气,也不愿占住了自己心爱之物的一角,让别人把它享用。”<sup>[15]</sup>这些话表明,在奥瑟罗眼中,妻子是丈夫所有的一件心爱之物,归丈夫支配。后来由于奥瑟罗误听了伊阿古的谗言,用戕害生命来处置他心爱的私有财产——苔丝狄蒙娜。

在《皆大欢喜》中,女主人公罗瑟琳一直以来被誉为莎士比亚的一大创造,但是其形象也并不真地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体现了女性的卓越和进取。虽然通过乔装打扮,罗瑟琳确实获得了那些在传统上原本属于男性的优秀品质,诸如理智、聪慧、勇敢、力量,但是在莎剧里,改换服装并不会导致对男性秩序的直接挑战,而女扮男装的罗瑟琳显然很高兴能够重新确认她作为女性的身份和职责。全剧最后一场,她对她的父亲和情人说:“我把我自己交给您,因为我是您的。”<sup>[2]196</sup>这时,她已经完全放弃了她在前几幕表现出来的那种无畏的女性主体意识,而自觉自愿地置身于一种从属的

地位,将自己像一份财产一样赠予了出去。因此,尽管《皆大欢喜》最终重建了一个新社会,但这个社会仍然是父权制的社会,它所强化的也是女性低人一等的旧观念。<sup>[16]</sup>虽然莎士比亚的确是尽了他最大努力去真实地反映生活,但是那个时代社会对女性狭隘的认识,以及莎士比亚作为男人这一事实本身,使得莎剧女性形象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限制、贬低,乃至歪曲。

### 三、莎士比亚男权思想产生的原因

莎士比亚的男权思想是与时代、性别的局限和个人经历分不开的。

第一,与作者生活的时代有关。莎士比亚虽然处于封建制度开始瓦解、新兴资产阶级开始上升的转折时期。但是,16世纪的英国社会仍然等级森严,整个社会有一个权力中心和一个从上至下的尊卑制度,构成极为重要的秩序。在家庭中,子从父,妇从夫,家长统治一切。在社会上,男性是社会的主宰,女性依旧是为了男性的需求而生存。她们无一例外地婚前听命于父亲,而婚后则受配于夫君。这种封建等级思想必然对莎士比亚产生影响,从而使他的女性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与男性作家身份有关。作为一名男性,莎士比亚必然会受到男性视角的限制,他不可能真正认识女性并了解女性的需求。所以他必然会不自觉地维护男性特权,在创作中他仍然会操持男性特权话语,把女性塑造为超越常规、改变既定性别和道德行为规范的可怕女人而加以否定——如《驯悍记》里的凯瑟丽娜、《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中的克里奥佩特拉、《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李尔王》中的大女儿和二女儿等等女性形象。也可以说,就是因为莎士比亚的男性身份使他不可避免地误解、歪曲女性人物。而这一点与当时的父权社会对妇女的态度是一致的。

同时,我们还可以以莎士比亚对“母亲”形象的漠视态度作为佐证。有研究者指出,在男权意识和传统思想左右下的莎士比亚,对正常的健康的母亲形象是持漠视态度和回避立场的。在四大悲剧中,只有两位能称为“母亲”的女角,在她们身上看不出多少母性的光芒,相反,却充分暴露了兽性的阴暗——寡廉鲜耻,缺少人性:乔特鲁德,是哈

姆雷特眼中淫荡不贞的生母;麦克白夫人,剧中并没有正面出现她的子女,因为她曾坦言:“我曾经哺乳过婴孩,知道一个母亲是怎样怜爱那吮吸她乳汁的子女;可是我会在它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从它的柔软的嫩嘴里摘下我的乳头,把它的脑袋砸碎……”<sup>[17]</sup>另外,在四出剧中很多重要角色的母亲已完全缺失,如《哈姆雷特》中的奥菲莉娅,《李尔王》中的考狄利娅,《奥瑟罗》中的苔丝狄蒙娜等。诸多母亲形象的缺场和空白表明,莎士比亚的男性视角下的叙事,已擅自把母亲贬为子宫,她们一旦为家庭提供了嫡系继承人便被剥夺了出场权。而无所不在的父亲关系网络就会把这些失去母亲佑庇爱抚的女性放逐于男性之中,从此变得愈发的孤独和无助。<sup>[18]</sup>

第三,与莎士比亚的个人经历有关。莎士比亚的个人婚姻生活经历也可以让我们对其偏见的性别观窥一斑而见全豹。1582年,还不满19岁的莎士比亚已经和一个长他8岁的富裕自耕农女儿安妮·哈舍薇结婚,婚后三年,他们生了三个小孩。1586年,莎士比亚离开故乡前往伦敦,夫妻两地分居长达24年之久。莎士比亚一直不肯把妻子接到伦敦团聚,不是因为创作、演出太紧张的缘故,也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困窘,而是他根本不重视妻子的缘故。他不曾与妻子商榷便将自已选择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她,令她生活在有名无实的婚姻里,虽生而犹死。更有甚者,莎士比亚在自己遗嘱中仅仅插写了这么一句:把我第二好的床及床上用品留给我的妻子。对为他含辛茹苦、拖家带口数年的妻子安妮,显示出近不近情理的冷漠。<sup>[19]</sup>

### 四、结语

通过解读《驯悍记》,我们能感受到,这是一部似喜实悲的戏剧,表面上表现了彼特鲁乔驯服“悍妇”凯瑟丽娜的胜利,实际上却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体现了男权社会的专制和女性的悲惨命运,流露出了莎士比亚的男权思想。

不可否认,在莎士比亚的其他作品中,他也写了众多的新女性,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他思想中保守的一面。尽管莎士比亚在自己的戏剧中热情地讴歌了人文主义理想,讴歌了资产阶级理想中的新女性,但是在对女性的看法上基本上是对

传统女性观的继承和赞同。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我们看到他对女性的期待,仍然是温柔娴淑、忠贞不二、知情达理。

莎士比亚的男权视角赋予了他戏剧作品中的大部分女性形象以悲剧命运,除了凯瑟丽娜之外,《哈姆雷特》中美丽善良的奥菲莉亚完全被父亲所利用,最终走向精神崩溃;《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最终成为家族恩仇的殉葬品;《奥瑟罗》中的苔丝狄蒙娜成为了奸诈邪恶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即使是以喜剧结尾的《仲夏夜之梦》中的仙后和《无事生非》中的贝特丽丝都是在被男性所征服之后,温柔的回到丈夫或爱人的身边。这些女性形象无论如何美丽贤淑或是大胆叛逆,却始终无法挣脱被男性控制、利用的命运。

综观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特别是其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我们不难发现:莎士比亚和他的笔下女性人物一样,无法超脱特定的时代和社会。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代的英国,不仅仅是莎翁的生存环境,其男权世界的特质也赋予了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男权视角。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是哈姆雷特痛苦呐喊,更是莎士比亚的真实心声。

#### 参考文献:

- [1] 杨莉馨.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期待——试论西方文学中的“家庭天使”[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80.
- [2] 莎士比亚全集(3)[M].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 [3] 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M].兰州: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184.
- [4] 许海峰.朗文高阶英语字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1485.

- [5] 杨莉馨.女性主义文论在中国[J],外国文学研究,2003(6),23.
- [6] 杨莉馨.扭曲的“镜像”——西方文学中的“悍妇”形象[J];中国比较文学.1998(3):45-54.
- [7] 王沙烈.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观[J],东北师大学报,2007(4):228
- [8] 莎士比亚全集(7)[M].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 [9]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66.
- [10] 王挺.西方文学中的女性意识[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5):56.
- [11] 戴维·赫布鲁克.文学中的妇女形象[M].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89,128
- [12] 莎士比亚全集(10)[M].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36.
- [13] 力萨·贾丁.重讲女儿:莎士比亚时代的妇女和戏剧[M].伦敦:Harvest出版社,1989:119.
- [14] 莎士比亚全集(4)[M].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40.
- [15] 莎士比亚全集(9)[M].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340.
- [16] 张琦.不能完成的颠覆——论莎士比亚女性主义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01(4):52.
- [17] 莎士比亚全集(8)[M].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326.
- [18] 王玉凝.从女性形象塑造看莎士比亚剧作的男权视角[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7(2):94-96.
- [19] 华全坤.莎士比亚新论——新世纪,新莎士比亚[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62.
- [20] 段海霞.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地位分析[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5).

责任编辑:刘承云

## Patriarchal Thoughts of Shakespeare in “*Taming of the shrew*”

YANG Xiao-lian, ZHANG Li-xi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In “*Taming of the shrew*”, Shakespeare portrayed such a “shrew” image of Katharina in the angle of patriarchy, made her tamed by her husband, and ultimately become a “good wife” who had lost herself. This pattern reveals the writer’s patriarchal thoughts. We will analyze it expressed in this work from the aspects of image-portraying, plot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s language, and give a further analysis of its reflection in other works of Shakespeare. It also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patriarchal thoughts of Shakespeare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time, gender limitation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Key words:** Shakespeare The Taming of the Shrew patriarchal thoughts image of female figure